

事业单位退休金之争

退休金风波又起。这次，主角换成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教育部直属高校(下称“部属高校”)——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近日向记者透露，部属高校退休教职工的年退休金比公务员退休金最多要低2万元，同时呼吁增加对部属高校的财政拨款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向有关部门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无论是在职的还是离退的，退休工资比同级别公务员低了近一半。

退休金每年最多差两万

近年来，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健全及完全覆盖，退休人员待遇问题逐渐凸显，成为社会热点之一。国家为纾解民困，也相继推出了多项政策法规。例如，2006年7月1日，我国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退休人员的工资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上调。再如，2007年，为了解决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差距过大、早期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偏低等问题，国家做出了逐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标准，2008~2010年“连涨三年”的决定。而当公务员退休金和企业退休金“普涨”之时，处于“中间段”的事业单位退休金却一直“按兵不动”。

“退休教职工比当地同级别的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年收入最多低了两万多元。”陈骏校长向记者介绍说。“江苏省退休公务员的退休收入要远远高于同一行政级别的南京大学退休教职工，江苏省省级机关科长的退休收入与南京大学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教职工的收入相差无几。”陈骏校长对记者说。

部属高校：“不堪重负”

在陈骏校长看来，导致大学退休教师工资偏低的原因之一是2006年进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下称“2006年工资改革”)中的相关规定。

记者了解到，2006年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下称《办法》)中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退休金按本人退休前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的一定比例计发。其中，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80%计发。

而目前，按照全国统一的办法，教育

部对部属高校发放的退休金是按学校每位退休人员年拨款13400元发给学校，其余部分退休金要由学校自筹。

“南京大学目前大约有2500名退休教师，每年自筹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这样下去，学校不堪重负，没有办法也无力为力再增加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陈骏校长告诉记者。由于部属高校经费紧张，自2007年以来就没有给退休人员增加过退休金。

其实，不仅是南京大学，据记者多方了解，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部属高校都存在类似问题，退休教职工普遍对此问题反映强烈。“我们希望国家能把学校承担的这部分承担下来。”陈骏校长向记者表示。

科研院所：退休工资低一半

其实，不仅是高校，国务院智囊机构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存在类似问题。

“我们做过一项简单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厅级干部，假如在行政管理部门退休，退休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一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研所汪德华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伟向记者分析，导致公务员工资普遍上涨，目前在改革的司局级公务员每月拿到6000~8000元。但是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一直没有向前推进。

“无论在职的还是离退的，拿的工资都比公务员低很多。”张伟说。

据记者了解，长期以来，我国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都是比照公务员工资标准建立起来的。在1993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前，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直是统一的工资标准。而2006年工资改革成为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差距的一个分水岭。

2006年，国家决定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同时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

2006年7月1日，我国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这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前三次分别在1956年、1985年和1993年)。

同时，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也开始酝酿，并提出了涉及全国130万个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确定的总体目标：建立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

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健全宏观调控机制。

但是，在2006年工资改革后至今，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能出台。

改革：向左向右？

近段时间，事业单位退休金改革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表现尤为激烈的是在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教育界等77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暂时停止在教师队伍中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起因是今年1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下发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天平”向“企业标准”倾斜，令早已对自身退休金增长停滞而不满的事业单位、尤其是教育单位退休人员更加不安。一时间，“教师退休养老金制度改革，应该等到将来与公务员退休养老金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的呼声四起，公务员的退休金成为教师们进行比照的对象。

此外，“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要与国家机关实行同一制度，不能形成新的‘二元结构’”等言论，也不时见诸报端。甚至有人提出，一些事业单位还应该和公务员一样，保持“铁饭碗”，拿到高待遇。

汪德华告诉记者，其实，2006年已经有事业单位改革的总方案，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的主要原因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事业单位哪些应该保留，以及是否还要继续保留原来的整体布局，事业单位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到现在仍在探讨。

另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已经有比如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市委党校等事业单位，在参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执行。不过，对此“传言”，记者并未得到相关方的正面回应。

“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进行内部工资改革的单位也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行政岗，就参照公务员执行；如果是技术岗，就参照职称路线。其他的事业单位，由于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没有公布，工资改革几乎都停滞了。但是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说明事业单位改革不会一直停滞下去，有可能正在向前推进。”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预测。据《中国经济周刊》

托老所之忧：公办容不下 民办条件差

“长春一养老院虐待老人”事件曝光后，内蒙古乌海市一无证老年托管中心4名老人又丧命大海。而年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一老人公寓也有7名老人惨遭火灾。这些陆续发生的养老机构安全事件，使托老所的安全、卫生、服务、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近日就此在内蒙古、江西、浙江等地进行了调查。

老龄化步伐加快 托老所需求上升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亿人，老龄化率为12%。上世纪90年代初，每10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人，而现在这一比例达到了3:1。

“人口老龄化正快速增长，高龄、空巢、失能的老人越来越多，我国正从居家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转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阿泰说，在一些财力较差的地方，养老机构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专业人才缺乏、资金短缺等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上海市唯一的公立敬老院1999年正式投入使用，位置十分偏僻，硬件条件一般，但这几年门庭若市。“全院80张床位常年都满了，受床位限制，敬老院只能优先满足农村五保户的要求。”该敬老院院长张培明说。

据调查，该托管中心没有任何证照，而这样的“黑户”托老所在海勃湾区老年托管中心，发现这里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三间平房错落落在居民区内。据参与救援的消防战士说，当晚的火势并不大，65岁的保姆发现起火后先是找邻居灭火，半小时后才报警，延误了最佳的救人时机。

据调查，该托管中心没有任何证照，而这样的“黑户”托老所在海勃湾区老年托管中心，发现这里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三间平房错落落在居民区内。据参与救援的消防战士说，当晚的火势并不大，65岁的保姆发现起火后先是找邻居灭火，半小时后才报警，延误了最佳的救人时机。

与同时，卫生条件差也是一个问题。在内蒙古一家“玉乐通老年托管中心”，20几个老人有的在输液打针，有的在轮椅上坐着。屋内空气混浊，老人的咳嗽声一阵阵。住进来的多数是脑梗患者，我得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挪大便，因为觉得是在做善事，所以也没有想过要办理什么卫生证件。”该托管中心投资人贺女士说。

一些养老机构收费混乱，服务水平较低。每月的收费标准在800元至1300元之间，为节省开支，护理事务多由经营者自己承担或者聘

优惠政策不到位 养老投资贷款难

我国日益明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将养老机构建设提上亟待解决的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破解这类难题。

上饶市信州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谢华芸介绍说，2006年开始，信州区政府投入50万元支持居家养老服务。

江西省部分城市试点居家养老模式，有的是政府主导，有的是专业机构和志愿者互为补充，提供多种形式的居家养老服务。南昌市东湖区长宁区民政局副局长周劲辉说，东湖区长宁区9.9万老人中，已有40%享受到了居家养老的服务。

内蒙古经济学家潘源东认为，养老机构本是公益性质，原则上应该由国家来提供，但从现实情况看，单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可能办好这件事。各级政府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以保障民办福利机构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要加强监管。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民办养老机构在获得土地、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条件明显不如公办养老机构。浙江奉化“99老人乐园”园长王雪飞说，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融资难，商业银行表示养老机构的房产不能作抵押。

上海市乌达区爱心敬老院负责人魏颖会说，他们已经多次申请每张床100元的床位补贴，但迟迟发不下来。

业内人士分析说，社会福利事业属于微利行业，投资大而回报周期长，需要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扶持。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时政点击

政府公信力不足是地方债券市场遇冷原因

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40亿元总额的2009年河北省政府债券5月7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截至当日收盘，该债券全天没有成交。同期上市的内蒙自治区政府债券和陕西省政府债券，也未能见到成交的怪圈。地方债面临着一级市场热情衰退、二级市场交易清淡的尴尬。

究其原因，有一种解释认为，“零成交”背后是“零信誉”，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是地方债券市场遇冷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解释的背后，人们是否购买地方债券的理由，似乎不是基于经济人对利润的关注，而仅仅是出于社会人对债务的不满。显然，这应该不是问题的真相所在。事实上，地方债虽然纳入省级预算管理，却是“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并代办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因此在债务风险和国债其实是基本相同的。先后发行的各地方债券，由于发行时市场环境不同，其票面利率也并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存在差距。

作为地方债券的潜在投资者，人们是否愿意投资地方债券，当然首先要考虑的是收益水平。即便投资地方债券和投资国债一样风险很低，但其1.6%左右的票面利率，显然对普通投资者缺少吸引力。除非地方债券跌破发行价很多，否则对于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来说，至少在目前发行尚未宣布进一步降息的利率水平上看来，是很不划算的。

如果说一级市场上还不至于一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大机构、大银行，对他们而言充其量只是减少一些预期收益却不会有多大的亏损风险，完全可以作为优化资产配置的一种手段；那么在二级市场上，普通投资者在购买自愿的前提下，却不会有那么大热情对利率超低的债券“积极认购”。更何况，在跌破发行价的市场中，大机构交易者持有的债券就意味着亏损，它们必然倾向于将手中地方债券持有到期。二级市场上交易清淡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盛翔

从一件事看做人的大义

在日本，大概没有钉子户这一说，但这并不妨碍那里的民众捍卫自己的权益时，也像钉子一样坚硬。

新近的一件事就颇能说明这个问题：静冈机场建设需砍掉跑道边几十棵树，所有人提出一个条件：换掉当地行政首脑，由此，静冈县知事石川嘉延19日向县议会提出辞呈。(5月20日新华社)

石川辞职无关贪污丑闻及其他事，只为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去年9月份，静冈县政府发现，因事先测量有误，原先规划的静冈机场跑道西侧有几十棵树。县政府想砍掉树木，但树木所在的土地所有人大多誓死拒绝砍伐。今年2月，大井提出，如果石川知事辞职，他愿意砍掉碍机场的那批树木。据媒体报道，现年49岁的大井对县政府的执政水平颇为不

满，认为只要不执行政首脑，行政不会有什么起色。3月25日，石川表示，只要大井将林木伐掉，他愿意应对方要求辞职。

树木终于伐掉了，波澜不惊，万事大吉。这里且不谈砍树与拒砍的是是非非，让人感到可敬的是两方面的态度及处理事情的方法。都说态度决定一切，而人的态度的端正与否最终决定了很多事情的结果，这绝非虚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做人的大义。做人的大义是什么？诚与信。作为有境界的人，石川和大井所言所行都体现了做人的大义。因为都深明大义，所以他们不会走极端。因为都深明大义，他们不会言而无信。因为都深明大义，他

们最后都将一己之利抛到了一边。他们所做之事，在他们生存语境之中，可能只算平常之事，但此事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力量却大得不得了，让人喟叹之余还让人感佩不已。

当然，这件事还能让人体会到其他或深或浅的意蕴。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慌乱不行，急躁不行，没有章法不行，解决问题要冷静、平允、理智、有序，大事小情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从做人的大义上讲，官员说话，应是丁是丁卯是卯，让人信服。作为民众中的个体，所说的话也该是一言九鼎。因为言不光是个人人格的破产，而且会对所有人的社会信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何看日本“非输入型”流感增加

现阶段我国的病例都有明显的输入性特点和途径，但是，一旦遇到像日本一样查不出明显的出境经历之时，对于所谓的非输入型流感就得多调查才能下结论。

此次甲型H1N1流感在日本越来越严重，病例中有很多被称为“非输入型流感”(即本土型流感或国内感染)。日本最早的提法并非“非输入型流感”，而是指国内感染。日本厚生劳动省16日宣布，兵库县神户市一名17岁的高三男生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日本首个国内感染病例。而从5月起该校并没有学生出国。此后，日本没有出国经历但又染上甲型H1N1流感的人越来越多，媒体便改称为“非输入型病例”。

流感是“输入型”还是“非输入型”并非只是称呼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对该病的防治。从人类经历的流感来看，一般都是由一处疫源地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监测网提供的信息表明，20世纪有5次波及全球的流感大流行，每次都导致数百万计的人死亡。其实，日本研究人员对非输入型流感也表示怀疑，认为日本本土的“非输入型”流感就是没有检测出来的输入型流感。日本最早发现的4例输入型流感，此后日本流感人数大增，而且感染途径不明，才被称为“非输入型”感染。日本官员认为，有可能是日本的入境检疫“失守”。这可能意味着日本的所有感染者其实也可

能是输入型，而且就是从北美传来的。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也表示：“日本已开始有一些案例找不到清楚的源头，表示(病毒)已在日本地区落地生根，若日本也发生，我相信香港一定会发生，现时的问题是：由美洲带来，还是从东南亚地区带入香港，两个可能性都存在。”这也表明，所谓的非输入型就是输入型，只是传播的路线和途径可能不同，但源头还是在北美。

日本所谓的“非输入型流感”对于我国的流感防控没有借鉴意义。现阶段我国的病例都有明显的输入性特点和途径，但是，一旦遇到像日本一样查不出明显的入境经历之时，对于所谓的“非输入型流感”就得多调查才能下结论。因为，所有这些流感都有可能因潜伏期长和隐蔽性强而传入的，也因此可能会在本土扎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至关重要。

现在要做这样的准备：例如，对于查不出明显入境经历的人，需要仔细调查发病前一段时间的所有接触者和活动范围，一旦发现通过输入型而扎根于中国本土，就有必要对本土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同时，需要扩大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增加网络实验室和哨点医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消毒隔离和个人防护等措施落实到位，防止甲型H1N1流感发生社区和医院感染，从而防止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大规模传播。 张田勤



漫画：住院未遂

17日，成都120和110接到一男子电话，对方称怀疑自己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120出动一辆救护车，六名医护人员；110出动三辆警车和六名民警，并在现场设置了近4个小时的警戒。医护人员为该男子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症状。原来他没钱住旅馆，想以生病为由骗取医院一夜的住宿……(据《新快报》)

各界对甲型H1N1流感如临大敌，得了这种病的人，虽被隔离，却是好吃好睡，《警察与赞美诗》中监狱的条件那是强得多，光这一点，已让无家可归的人羡慕万分。新闻中的男子也想开开心洋，无奈此病目前尚属稀罕，无从得逞，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还被严肃批评教育了一番。图/春鸣

吸毒的满文军并非“一个人的堕落”

歌手满文军被曝19日凌晨因涉嫌聚众吸食摇头丸等毒品，在北京朝阳区工体附近某酒吧被带走，据北京市公安局知情人士透露，警方目前已确认满文军夫妇尿检呈阳性，进一步行动正在落实中。(《京华时报》5月20日)

吸毒、酗酒斗殴、为虚假广告摇旗呐喊，甚至涉黑——最近几年，屡屡有演艺界明星深陷种种丑闻的报道。明星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故而有别明星违法也并不稀奇。但作为影响力颇大的公众人物，社会又期待其保持正面的积极健康形象。因而，每逢“问题明星”被曝光，在遗憾之余，社会各界都发出用心良苦的“呼吁”，希望明星严格自律“洁身自好”。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

从景岗山、零点乐队的“涉毒”，到谢东吸毒，再到今天的满文军聚众吸毒被抓，公共的“呼吁”之声不绝于耳，但一些明星的“与毒共舞”却始终没有停歇。不仅吸毒，近年来，娱乐圈越来越像充满暴力和色情的大染缸；出了“放火”的窦唯，出了吸毒的谢东和满文军，也出了涉黑的戴天翔，出了床上换戏的“法则”……再加上参与虚假违法广告宣传和明星比比皆是，这一群体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记得北京市消协还为此数次向社会公开发表了《致社会名人、明星的一封信》，建议明星提高社会责任感，拒绝承接虚假和可能对公众进行误导的广告。但社会的批评和谆谆劝导言犹在耳，一个明星又前赴后继地走向自我毁灭的泥潭。显然，社会舆论的道德拷问并没有引起明星们一丝半点的重视和自省。

明星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固然有其自身素质问题，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对于明星的一种来自于制度和社会的“纵容”。譬如虚假广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为之做广告的明星无疑负有责任，可他们想，有几个明星为之付出“代价”？照旧是唱歌唱、舞跳跳、广告照拍。

一夜成名天下知，旧社会被社会鄙薄的“戏子”如今一跃上另一个极端，只要有名气，就成了“特权人”，可以超生、可以狂妄、可以偷税、可以高人一等……世人掏钱为他们的名气买单，还要给予其无限制的“超国民待遇”——吸毒的满文军并非“一个人的堕落”，今日之堕落，是个体因素也有社会性“溺爱”的推波助澜；而回过头来想想，对于娱乐圈、公共管理确乎是出现了缺位，人们常说厂有厂纪、行有行规，试问娱乐圈的“行规”在哪里？公权不彰，私权泛滥，导致了娱乐圈的乱象丛生。这种情况不彻底改变，满文军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吸毒的明星。 陈一舟